



走进津沽打卡地 探寻戏剧大师与他严师的往事

曹禺故居里的“雷雨”前夜

文图/井振武

天津意式风情区，民主道23号两幢清幽的意式小楼静立街边。门前1.2米高的曹禺半身铜像目光深邃，凝视着往来的人潮。

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其艺术生命真正的起点，并非笔尖，而是舞台；其最重要的引路人，并非旁人，而是那位被他终生敬称为“导师”的张彭春——张伯苓的胞弟。严修与张伯苓是最早提倡在校园演文明戏（话剧）的先驱，而张彭春不但引进欧美话剧的导演制度，继往开来，还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曹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当您推开曹禺故居纪念馆的这扇门时，探寻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巨匠的故居，更是关于一座城市与中国话剧百年风华的深度记忆。

从“孤独少年”到“戏痴”萌芽

1910年9月24日，曹禺（本名万家宝）出生于天津小白楼，不久后便迁居至当时意租界二马路28号，即今天的民主道23号。在这两栋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格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里，他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关键十五年。

推开曹禺故居纪念馆大门，那段岁月扑面而来。馆内珍贵照片和旧物丰富，静静诉说着少年曹禺的苦闷与启蒙。而最能触动人心的，是后楼“万公馆”的原貌恢复——走进二楼那间童年居室，花梨木雕床、透着微光的百叶窗，仿佛还能捕捉到那个少年的身影。

曹禺生在没落官宦家庭，生母早亡，备遭打击，常感孤独与无助。根据他的回忆：“姐姐教他学习写字，妈妈领他看各类戏剧；在家馆由方地山开蒙，还到官银号汉英译学馆学英语……站在家中阳台，遥望绿牌电车轨道尽头的老西开教堂，耳听钟声阵阵；去老龙头车站看冒着白烟的火车远去，思考人生的路。”正是这种“终日弥漫着忧郁、伤感的环境”，熔铸了一个敏感而早慧的灵魂。他贪婪地翻阅父亲书房中的书籍、杂志，“阅读《水浒》《三国》《红楼梦》以及外国小说”，那些文字如同种子，悄然埋入心田。



曹禺考入南开中学后，插班在二年级读书。从此，他的人生与这座校园、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的曹禺故居纪念馆，不仅是了解他生平的窗口，更是一处沉浸式文化体验地——2022年，故居旁的曹禺剧院经过改造后重新启用，时常上演沉浸式主题演出，实现了从“看故居”到“品戏剧”的活态传承。对于游客而言，这600余平方米的空间，正是通往那个时代天津人文风情的时光隧道。

师生缘 张彭春与曹禺

如果说故居孕育了曹禺的情感底色，那么南开中学则点燃了他的艺术生命。彼时的南开，在新剧（话剧）领域已开风气之先。据考证：1907年在天津天仙戏院，由王钟声、刘木铎等人携班演出法国拿破仑史实戏是文明戏传入天津的最早记录。1909年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提倡新剧，自编、自导、自演《用非所学》新剧，唤醒同学，改良社会。1914年又成立“南开新剧团”，排演《华娥传》《一元钱》等新文明戏。而站在这一浪潮之巅的，正是校长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1910年，他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其间钟爱文学与戏剧，悉心研究，获哲学博士。1926年，张彭春返回南开主持新剧团工作时，遇到了那个对戏剧如饥似渴的少年——曹禺，“一下子被浓烈的戏剧氛围所吸引，毅然加入新剧团，参加的第一个演出，是洪深《少奶奶的扇子》。为此，天天背台词，把个剧本都翻烂了。又参演霍普曼的《织工》，深受震动，晓得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需要看什么，不需要看什么。”在曹禺的记忆中，“我大约在十五岁时，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出过许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

这段师生情谊，是严苛的打磨与无私的提携。张彭春“作为导演执法甚严，常常把排演当上课、以演员为学生。”曹禺回忆：“1928年10月，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妇女界甚至认为“此剧对提倡女权有帮助，特邀第三次公演。”

张彭春对曹禺的教诲不止于表演，还鼓励其转向创作。他将莫里哀的《悭吝人》交给曹禺改编为《财狂》，“舞台设计林徽因，曹禺饰演韩伯康，女主角由女生饰演，在瑞廷礼堂公演。”一位同学观后说：“看后真使我大开眼界，并对曹禺的精湛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剧还打破男扮女装的旧习，令人耳目一新。”1929年，张彭春赴美前，将一套英文版《易卜生全集》赠予曹禺。曹禺回忆说：“这套书对我影响很大，我依靠一本英文字典大致把它读完了，懂得了许多戏剧技巧。”正是这套翻烂字典才读完的书，为曹禺打开了现代戏剧技巧的大门。多年后，当曹禺在《雷雨》序言中写下“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时，这段津门师生缘，已然结出了中国话剧最丰硕的果实。

名著背后的 天津“印迹”

在导师的引领下，曹禺不仅积累了深厚的舞台经验，更积蓄着创作的冲动。1926年9月，他以笔名“曹禺”在《庸报》上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踏上创作之路。父亲突然病故，曹禺倍感世态炎凉，回望万公馆往事，孤愤不已，一股写作冲动涌上心头。他构思以英租界周公馆为背景，给每

个人物都写了小传，“草稿满地，反复揣摩，巧妙构思，历时五载，终于完成四幕话剧《雷雨》。”

1934年7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全文刊载。次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希望排演《雷雨》，曹禺热心支持，现场指导，‘新剧团’派吕仰平担任导演。10月，中国旅行剧团来津，在新新戏院公演《雷雨》，实力派演员阵容强大，技艺一流，在津门掀起旋风般地强烈震撼。”《雷雨》一剧“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社会反响强烈。《大公报》《益世报》等好评如潮，《大公报》评论说，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据统计，到1936年底《雷雨》演出600场，历久不衰，创造历史。

1936年，《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曹禺在扉页上写下：“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此后，他文思勃发，又写出《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伟大作品，在中国话剧界一举奠定了“东方莎士比亚”的历史地位。

沿着曹禺的足迹“深行”天津，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舞台。惠中饭店（今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附近），这座当年曹禺常去的场所，正是《日出》中陈白露生活的环境。这里曾发生过交际花自杀的事件，深深触动了曹禺。他在饭店房间里，望着不远处正在兴建的中国大戏院的工地，听着工人打夯的号子声，将这些声音写进了《日出》的奋歌里。而剧中李石清让黄省三跳楼的地方，原型就是惠中饭店附近的渤海大楼。

更值得探访的是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附近的贫民窟——那是《雷雨》中鲁贵家的所在，“侍萍气愤至极，投河自杀，被救，嫁给住老龙头车站附近贫民窟的鲁贵”。还有旧时南市的“三不管”，那是《日出》中翠喜、小东西等底层人物挣扎求生之所。曹禺曾为了解妓院生活深入南市调查，甚至遭遇流氓殴打。正是这种将现实主义的根须深深扎进天津土壤的创作态度，才让他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今天，当您参观完曹禺故居纪念馆，不妨移步至旁边的曹禺剧院，看一场学生剧社排演的《雷雨》片段。在那一瞬间，你或许会恍惚看到：百年前的瑞廷礼堂内，张彭春正在给那个叫曹禺的少年细说戏；而百年后的今天，这份对戏剧的虔诚，依旧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流淌。这，就是津沽大地馈赠给每一位旅人最深沉的文化故事。